
该文发表于《中国战略观察》，2020年第3-4期

中美博弈关系再解读

——基于世界治理手段变迁的视角

赵远良

内容提要：各国为谋求自身的生存与发展而进行彼此博弈是国际政治的常态。大国统理世界的手段主要有统治和治理两种方式，但两者具有同质性，其目的都在于谋取本国的生存和发展利益。传统治理手段主要表现为战争与暴力，大国间博弈的方式主要是霍布斯式博弈。二战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不断创新和设计统治世界的方式，其手段包括：治理手段法制化与模式化、固化工业化水平的等级、利用美元霸权地位攫取他国经济利益、形成技术与人才的流动格局、主导国际制度、对战略资源进行控制与垄断等。目前的中美贸易摩擦体现出两国关系的竞争状态，折射出中美在治理手段上的洛克博弈方式。中美关系总体置于洛克式博弈的框架之下，两者滑入霍布斯式博弈的可能性不大。

关键词：治理手段，霍布斯式博弈，中美关系，洛克式博弈

作者简介：赵远良（1975-），男，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编审、博士，主要研究方向：中美关系、大国外交。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建国门内大街5号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1558室，邮编：100732；电话：13693261008；Email:iwepcass@163.com

Governance Transformation and Sino-US Game Evolution

Zhao Yuanliang

Abstract: For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gaming between countries has always bee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normal. Great powers either rule or govern the globe. Though homogenous, rule and governance all aim at maintaining the interests of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great powers. Before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games between major powers were mainly Hobbesian which had been filled with wars and violence. Afterwards, western powers, headed by the U.S., have continued innovating and designing means to rule the world, which include legalizing and modelling the ways of governance, solidifying industrial stratification, capturing external interests by the hegemony of dollar, promoting technological and talent flow, guiding international regime transformation, and monopolizing strategic resources. The current trade friction embodies the competitive status quo of Sino-US relations, and reflects the Lockean gam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in terms of governance. Sino-US relations are generally within the framework of the Lockean game, and it is unlikely that the two will slide into the Hobbesian

game.

Keywords: governance, Hobbesian game, Sino-US trade friction, Lockean game

Author: Zhao Yuanliang, Associate Editor and Ph.D., Institute of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大国经略世界，主导世界格局，其手段是多样的，在表现形式上或曰统治，或曰治理。在无政府状态下的国际政治中，国家行为体都在为寻求权力、维护并扩大自身利益与他国进行博弈，因此，国际政治总是处于一种无休止且旨在争取权力与利益的博弈状态之中。在世界政治博弈中，国际政治行为体采取何种手段（无论是统治手段，还是治理手段），其目的都在于谋取本国的生存和发展利益。大国治理世界的手段变迁也决定了各国博弈的类型的演进。

一、大国经略世界的手段：统治与治理

统治与治理是大国统理世界最主要的两种手段。总体来说，统治手段更直接，往往与暴力相联系；而治理手段则具有一定的隐晦性，往往与有规则的竞争相联系。具体而言，统治手段是指施动者依据自身力量和相关制度基础，对他者进行控制的方式。秩序的维护者和主导者往往会依靠其自身的实力采取强制手段，迫使他者遵守既定的规范。对于国际政治体系中的国家行为体而言，一国（特别是大国）往往会依靠其权力来控制、支配和管理其他国家，进而实现其利益。

治理一词来自拉丁文和古希腊文，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有时候也做“统治”的替代词使用。英语词汇“governance”开始被广泛使用，^①主要源自世界银行在1989年发布的《撒哈拉以南：从危机到可持续发展》报告，^②该报告首次提出了“治理”的概念，随后“治理”一词迅速成为社会科学的一个广泛使用的词汇。美国学者罗西瑙将“治理”界定为一系列活动领域的管理机制，认为治理是规则空隙间的那些制度安排。^③联合国全球治理委员会（CGG）对“治理”一词也进行过界定，认为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机构管理它们共同事务的诸多方法的总和，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利益得以调和，并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过程。^④总体来说，治理着力于权力与利益的设计与安排，其表现手段上主要是在有能力且有意愿的大国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主导下，采取多国参与的方式以解决跨国

^① H. G. Frederickson, “Whatever Happened to Public Administration? Governance, Governance, Everywhere”, in Evan Ferlie, Lawrence E. Lynn and Christopher Pollitt ed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Public Managemen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282 - 304.

^② Malcolm J. Blackie, “Sub-Saharan Africa: from Crisis to Sustainable Growth: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1989.

^③ [美]詹姆斯·N·罗西瑙著，张胜军等译：《没有政府的治理》，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④ The UN Commission on Global Governance, *Our Global Neighborhoo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2.

“问题”为目标共同行动。

随着国际政治的演进，描述国家间竞争与博弈的政治术语也随之在演进。在传统意义上，“统治”体现更多体现的是大国权力优势与武力特征，往往与国家间的霍布斯式博弈相关。“治理”往往与“善治”密切联系，^①在国际政治中旨在体现有序和协调的价值取向，一般对应国家间的洛克式博弈，这也是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该概念被广泛使用和接受的原因。但是，由于国际社会并不存在一个世界政府，各国仍处于霍布斯所说的“自然状态”，大国博弈的终极目标并没有改变（即谋取生存并获得更大的权力），各国参与治理世界的目的旨在获取本国的安全利益、经济利益和发展利益。

二、历史上西方强国的统治手段与霍布斯式博弈

世界历史可谓波澜壮阔，大国兴衰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内容，而大国兴衰与其统治手段密切相关。传统统治手段主要表现为战争与暴力，大国间博弈的方式主要是霍布斯式博弈。霍布斯式博弈是世界各国基于自助原则和强者生存的理念，彼此采取排他性的方式展开竞争与争斗，以零和博弈的方式获取权力和利益。其本质是零和博弈，主要表现形式是暴力与战争。

美国现实主义学者汉斯·摩根索认为，国际政治的本质在于各国为争夺权力而进行争斗。^②权力作为一种强制力，是以其意志左右他人行为的能力，不管他者是否愿意。同时，由于权力分配反映出各行为体在政治领域的不平等性与等级性，各国家行为体势必会争夺权力而发生战争。战争作为有组织的暴力行为，其最终目的是为某个民族、国家或国家集团的经济而服务的，追求一定的经济与政治利益是它们进行战争的关键所在。在霍布斯式博弈状态下，战争攫取与殖民征服是大国获取财富和权力的重要统治手段。具体而言，大国（特别是核大国）之间的博弈方式经历了从霍布斯式博弈到洛克式博弈的演进阶段。

（一）战争掠夺手段与霍布斯式博弈

世界强国的兴衰史几乎就是一部战争史。战争中获胜的一方，其收益是领土的扩大、资源的增加、人口的扩充、等级秩序的建立和未来持续利益的获得。在无政府状态下，战争是获取权力的终极手段，也是有效方式。通过战争，赢家获取财富和统治的支配权，进而增进自身的权力等级，从而实现对他国的控制。因此，战争不仅是政治的继续，还是获得政治权力的有效途径。

自15世纪以来，葡萄牙、西班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俄国和

^① 关于治理的讨论可参见俞可平主编：《治理与善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② [美]汉斯·摩根索著，徐昕等译：《国家间政治：权力斗争与和平》，第四章“寻求权力的斗争：现状政策”之内容，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美国这9个国家在历史上先后崛起。通过分析这些国家的崛起历程，发现它们最重要的共同点是：发动战争掠夺财富，武装国家获取权力。例如，15-16世纪的葡萄牙和西班牙依靠新航线，发动了对殖民地的战争，采取殖民掠夺的方式建立起了全球性的殖民帝国。^① 荷兰则通过参与了一系列国际战争成为17世纪最有影响力的国家。^② 英国的崛起也是通过战争和掠夺方式来实现的。英国从西班牙手中攫取了海上霸权，随后成为世界上头号殖民强国，并保持着世界霸主的时间约四个世纪。法国在其兴起过程中不断与外国发生战争，特别是在拿破仑执政期间，法国对外战争连绵不断，发动了一系列对外战争，吞并了欧洲广大土地。毫无例外，纳粹德国与法西斯的日本也将其繁荣建立在对外掠夺上，例如“拓展生存空间”与“保障生命线的安全”就分别成为德国和日本对外扩张的借口而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俄国的发展也是一部领土扩张历史，自1689年彼得大帝实施改革后就开始了对外的征服和战争，其领土甚至扩张至北美洲。美国的发展与崛起也没有逃脱这个“国兴必战”的历史规律。从19世纪开始，美国就开始对外扩张，利用战争，从战争中获利，利用战争崛起，其中的奥妙对美国建立霸权来说是不言而喻的。

总体而言，西方大国崛起无不与战争和掠夺联系在一起。在大国的兴衰与更替中，最直接的逻辑是从丛林法则和暴力原则，国际政治的突出表现就是战争与冲突，而和平的时间总是短暂而稀缺，各国关系处于霍布斯式博弈的状态。

（二）殖民统治手段与霍布斯式博弈

殖民统治是一国对他国进行奴役和占有的过程。资本输出、奴隶贩卖、战争掠夺、原料掠夺、商品倾销等方式是传统的殖民主义的主要手段。殖民统治在资本主义初期，各殖民大国往往采取暴力手段来完成资本的原始积累。这些统治手段包括武装占领、海外移民、海盗式的掠夺、欺诈性的贸易、血腥的奴隶买卖等。此外，欧洲列强还通过所谓“自由贸易”的方式，把落后国家、民族和落后地区变成自己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以及廉价劳动力和雇佣兵的来源地。以英国殖民统治为例，印度是英国海外财富的最大掠夺来源地，以至于英将印度比作为其帝国王冠上的珍珠。^③ 正如英印总督寇松说的，如果失去印度，英国会降成三流国家。保罗·肯尼迪评述到，“英国人在印度留下了引人注目的遗迹……殖民战争同时出现的流血、掠夺和抢劫……1800年，欧洲人占领和控制了世界土

^① 葡萄牙帝国是历史上第一个全球性殖民帝国；16世纪中期，西班牙在各大海洋开拓贸易路线，凭借其经验充足的海军，西班牙帝国称霸海洋。

^② 17世纪被认为是“荷兰的世纪”，荷兰参加的战争有：三十年战争、三次英荷战争、荷法间的关税战争等。

^③ RT, “Bloody jewel in crown of British Empire: How India was mistreated during colonial rule”, *madridjournal*, 13 Apr, 2019, <https://madridjournals.com/2019/04/13/bloody-jewel-in-crown-of-british-empire-how-india-was-mistreated-during-colonial-rule-2//>.

地面积的35%，到1878年，这个数字上升了67%；到1914年，达到了84%以上。”^①埃里克·沃尔夫认为，东印度公司能够迫使印度资源服从于英国本土的财富的积累，他们把大量掠夺来的私人财富运回英国投资，无偿地转入欧洲股东手中。这位股东创造的财富是难以想象的。^②可以说，英国殖民统治和掠夺是其成就世界帝国的经济基石。

西方在近500年统治世界的历程中，其繁荣的基础除了西方所宣称的工业革命这个关键因素外，更重要的原因是对亚非拉地区实施殖民统治。工业革命所提供的“船坚炮利”为西方殖民拓展提供了器物与技术方面的支持。“如果没有远方而来的金、银、棉花和人力，想要对西方的制度体系进行融资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些体系最终为工业化发展铺平了道路。”^③对此，马克思深刻评论说，“美洲金银产地的发现，土著居民的被剿灭、被奴役和被埋葬于矿井，对东印度开始进行的征服和掠夺，非洲变成商业性地猎获黑人的场所：这一切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④总结西方国家近现代以来的发展和崛起，无一例外靠都是暴力战争和掠夺而发达的。

马克思对此一针见血地指出，“原始积累在政治经济学中所起的作用，同原罪在神学中所起的作用几乎是一样的。”^⑤历史学家如保罗·贝洛克和费尔南·布罗代尔认为，殖民剥削创造了西方繁荣却致使别处贫困，是富裕国家造成了第三世界的贫困化。^⑥安格斯·麦迪逊则明确指出，第三世界的落后必须由殖民剥削来解释。^⑦因此，从本质上来说，西方的“发达与富有”是暴力掠夺的产物。西方制度是掠夺其他国家所导致的结果，然后在此原始积累的基础上，随后又成为其维持发达的原因。就此而言，霍布斯式博弈是西方列强攫取利益和权力的有效手段，其核心在于零和博弈，国家崛起过程充满暴力和血腥。因此，西方崛起的逻辑顺序是：西方先有了血腥的财富积累，其后才有了国家制度的建设。在因果关系上，制度是发达的结果，而财富的掠夺和积累是前提。

随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出现，世界经济朝着自由贸易方向进行调整，商品、资本和劳动力、技术等方面的流动越来越有世界性，在这种情况下，旧有的殖民主义体系已经越来越不适合历史潮流发展的新变化，旧有的封闭的、排他的、以占有土地为目的的殖民主义体系面临着危机，也难以为继，霸权国需要谋求新的统

^① [英] 保罗·肯尼迪著，王保存等译：《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革与军事冲突》（上），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154页。

^② [美] 埃里克·沃尔夫著，赵丙祥等译：《欧洲与没有历史的人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

^③ [美] 乌戈·马太·劳拉·纳德著，苟海莹译：《西方的掠夺——当法治非法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5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6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290页。

^⑥ [英] 黛安娜·科伊尔著，李成、赵琼译：《高尚的经济学》，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6页。

^⑦ [英] 安格斯·麦迪森著，伍晓鹰等译：《世界经济千年史》，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4页。

治方式，而美国就成为了新的统治方式的设计者和倡导者。^①

三、新型治理手段与洛克式博弈

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开始设计和倡导新的统治方式，提出“门户开放”政策，这成为大国统治世界新模式的一种尝试。这种新的统治方式与旧有的殖民主义政策存在一些不同：其一，美国倾向于建立“无边界的殖民体系”；其二，谋求对他国的间接控制；其三，不赞同垄断式的殖民保护，而主张“门户开放”和实行“自由贸易”。有学者评论说，相比传统的殖民体系（如英国的殖民统治）的封闭、有形等传统形式，美国的“门户开放”在当时的历史阶段，所体现的是一种开放的、无形的统治体系，这也使其有强大竞争力和渗透力，更符合当时的历史发展潮流。^②

以此为开端，西方国家（特别是以美国为主）在随后的历史进程中，不断设计和实践出新的世界治理手段，大国博弈因此也采取了新的方式——洛克式博弈。尽管国际政治的无政府状态还是一个常态，但大国博弈的层级和内涵则是一个动态的概念。大国博弈会随着技术的进步、权力统治方式的变革、文明的演进而发生改变。从这个角度看，大国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中的博弈状态将呈现出递进的发展趋势：从霍布斯式博弈转向到洛克式博弈。

洛克式博弈的核心要义是博弈各方遵循“生存与允许生存”的准则，不以彻底毁灭对方为目标。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指出的，“公开的侵略所付出的代价高昂，经济力量和意识形态可以起决定性的作用。”^③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国不断创新和设计统治世界的方式和手段来攫取世界财富并实现对权力的维持，其手段包括：

（一）掠夺手段的“法制化”

在国际社会中借以“法治”的方式，将他国财富进行掠夺转移，这既具有合法性，也非常具有隐蔽性。因此，一些国际规则和法律日益成为西方世界为征服和掠夺进行辩护、管理和授权的工具。法治在一定程度上为西方国家的掠夺披上了美丽的外衣。正如美国学者乌戈·马太(Ugo Mattei)所说的，“法治”一词忠诚地为掠夺服务，在世界上几乎所有的法律体系中找到西方合法性概念的影子。

^④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凭借强大的实力，推销体现美国利益的所谓的普世价值观（美国治下的和平与华盛顿共识）而享有盛名。法治也因此掩饰了美国与被掠夺

^① 王玮、戴超武：《美国外交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84页。

^② 王玮、戴超武：《美国外交思想史》，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207-208页。

^③ [美]理查德·尼克松著，谭朝洁等译：《1999：不战而胜》，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46页。

^④ [美]乌戈·马太、劳拉·纳德著，苟海莹译：《西方的掠夺——当法治非法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第29页。

者的关系，掠夺者也得到了法制的合法庇护，这也使美国表现出它是一个有普遍“善意”的政治行为体，是一个有益于国际公益的秩序提供者。^①因此，治理手段在早期阶段，霸权国为确保对其有利，凭借其武力和强权采取了非对称性的交换模式，体现了“权力下的领土逻辑”与“权力的资本逻辑”。^②

使用法治的方式将掠夺合法化，其采用的主要方式是输出经济模式如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这种模式被美国学者乌戈·马太与劳拉·纳德视为掠夺经济的引擎。这种模式没有通过战争的方式，而是通过使掠夺合法化的法制手段来实现其掠夺目标，如在全球推广新自由主义价值观，即在经济上推行私有化、政治上美化“良治”政府、文化上输出“普世价值”。乌戈·马太对此批判说，西方的新自由主义是掠夺的经济引擎；西方还是思想掠夺及其合法性提供者，如知识产权就是思想的掠夺；西方善于使用双重标准的政策，也借口“贫困”问题让西方对他国的干涉正当化；美国法律正吞噬着国际法，并成为全球的统治形式；甚至在选举政治和“反恐”战争这类高层次的政治问题上，美国都冠以“法治”的名义进行。^③

（二）工业化布局的等级化

利用工业化水平阶差可以实现西方国家所认为的“合法”掠夺和财富的转移。从发展阶段上看，由于第一次工业革命与第二次工业革命首先勃兴于西方国家，故产生了优势路径，进而将世界分为富裕的西方以及相对贫穷的其他地区（如亚非拉地区）。富裕的西方则具有较高的工业化程度和现代化水平。在传统的国际劳动分工下，世界经济被分成了大致的两个板块：“工业中心”和“外围”地区，这两个板块之间的关系是不对称的。^④依附状态是某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取决于另一些国家的发展和扩张的状态，这使依附国家处于被那些主导国家剥削的落后地位。^⑤

作为新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以及世界体系理论的创建者，美国学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就认为，外围地区沦为了中心地区的经济附庸。^⑥同时，中心主导国家由于是现行国际秩序的设计者，它们通过控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以及世界贸易组织等国际组织掌握着国际金融、贸易规则的

^① Richard Falk, “Re-framing the Legal Agenda of World Order in the Course of a Turbulent Century”, in Micheal Likosky, ed., *Transnational Legal Proces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② [意]杰奥瓦尼·阿锐基著，姚乃强等译：《漫长的20世纪：金钱、权力与我们社会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39-40页。

^③ [美]乌戈·马太、劳拉·纳德著，苟海莹译：《西方的掠夺——当法治非法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版。

^④ Raúl Prebisch, “Commercial Policy in the Underdeveloped Countries”,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XLIX, 1959, p. 251.

^⑤ Theotonio Dos Santos, *La crisis del desarrollismo y la nueva dependencia*, Buenos Aires, Amorrortu Editores, 1969. 转引自秦亚青著：《霸权体系与国家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1页。

^⑥ 《现代世界体系》是沃勒斯坦颇具影响力的多卷本著作，其理论观点参见[美]伊曼纽尔·沃勒斯坦著，郭方等译：《现代世界体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

制定权，在经济行为中预设了对其有利的规则。从国际政治的现实来看，主导国的制度霸权还有进一步强化的趋势。发展中国家在投资、贸易和消费这三个因素方面严重依赖西方发达的大国，从而在政治上也形成了特定的中心与外围的关系。

此外，优势国家通过技术水平的落差来实现财富的转移。首先是对技术的延长和落后技术的转移。发达国家一般会把在本国趋于过剩或被淘汰的技术项目、有害于生态环境的技术生产设备和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发展中国家由于路径依赖而被迫限制在技术层次较低的等级上。因此，发展中国家蒙受的损失不仅表现在经济上，更重要的是它们有可能还会丧失了发展经济和发展生产的动力，在生态环境上却又陷入了恶性循环。这种结构带来的后果是，发展中国家输出自然资源，遭受本国自然环境的破坏，丧失可持续的发展能力，继续成为发达国家的附庸。

（三）主导货币的霸权化

二战以后，美国凭借其强大的实力推行马歇尔计划，设计了美元的世界体系，形成了美元霸权。美国通过在近半个世纪里的实践，美国找到了一种合理合规且隐蔽的治理手段：利用金融和货币手段，从全世界的经济体中攫取利润向美国转移财富。也就是说，美国只需要印刷美元便可从世界各国获得物质财富。有了军事做后盾以及科技实力做支撑，美元就可以作为硬通货在全世界畅通无阻，随心所欲地操纵将纸币转化为实物财富。^①所以，美国发动一系列战争的全部秘密在于美元。^②德国学者赫尔弗里德·明克勒也认为，“起决定作用的是美国操纵世界经济资本流，控制其他货币兑换美元的价值以及通过不断创新决定世界经济发展节奏的能力。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控制权以及保持美国研究机构和技术中心的吸引力，所有这一切都确保美国获利。”^③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人最基本的生存方式就是金融生存，在操作美元的流入与流出中，就能实现对世界财富的攫取，且手段隐蔽。

美元霸权还可采取以货币输出的方式对全球经济进行“剪羊毛”。美元的无限扩张势必会引起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因此，美国通过操纵美元的量化宽松的方式输出，可以让他国为美国承担通货膨胀的风险，正如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内阁财政部长约翰·康纳利在1971年所说的，“美元我们美国的，问题是你们欧洲各国的。”^④因此，在全球的财富转移和财富掠夺的手段上，战争不再是主要途径，

^① 乔良：“美元霸权与中美棋局”，《国防参考》，2015年6月30日。此外还可参见[美]廖子光著，林小芳等译：《金融战争——中国如何突破美元霸权》，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

^② 乔良：《美国的逻辑：意识形态与内政外交》，中国经济出版社，2011年版，140页。

^③ [德]赫尔弗里德·明克勒著，阎振江、孟翰译：《帝国统治世界的逻辑——从古罗马到美国》，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版，第51页。

^④ Maria Lorca-Susino, “The US Dollar and the Euro-Deus Ex Machina: The Dollar May be Our Currency, but It’s Your Problem,” *European Union Miami Analysis (EUMA)*, Vol.5, No.9, 2008, p.1.

而是越来越体现在金融上。^①在冷战期间，苏联的 GDP 曾达到美国的60%，其军力不亚于美国，但在苏联解体前夕，美国发动的对苏联的金融战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乔万尼·阿里吉认为，美国用金融手段实现它用军事力量不能实现的目标，即在冷战中打败苏联，因为在军备竞赛中，美国能够动员苏联完全不能企及的金融资源和手段。^②

美国凭着货币霸权，建立了全球最庞大的军队、顶尖科技能力、最大的经济体、国际制度的标准、信用评级标准等。反过来，美国主导制定的这些标准和手段又可以维护美元霸权的地位。正如美国学者罗伯特·吉尔平所指出的，美元是美国霸权的基础，其原因在于它的核威慑力量。^③学者何新分析了美元如何从流出到流入过程中实现对他国进行财富攫取的大致循环过程，认为美国经济是一种“债务经济模式”循环模式。也就是说，美元在全球经济的流通中能发挥出其财富收割的作用，用极低的代价享受了全世界的劳动成果。凭借美元的国际通货地位，美国可以按照“体外循环”的方式来延续对世界财富收割这个过程。

（四）科技人才的攫取化

世界大国首先是人才大国，决定一个国家在世界地位的关键因素是人的因素。人才战略之所以能让一个国家或地区超常规地实现发展，其关键是通过人才掠夺的方式，使这些国家或地区能够在基本不付出投资或投资极少的情况下，实现系统地、批量性地、持续地对他国优秀人才进行“收割”，而优秀人才通过各种方式移民该国后，他们并不像别的物质商品只能被单纯地消费、消耗，他们本身具备的优秀素质、巨大能量以及强烈的理想抱负和上进心，使他们成为推进社会文化、工商经济、科技教育事业前进的发动机。

例如，二战以来，全球众多优秀的科技人才被网络到美国，他们为美国所做的贡献在经济利益上都无法统计。王辉耀认为，在以知识经济为主的美国，人才资本比实物资本更重要。美国是全球人才竞争中最大的人才流入国。全世界有1/4的留学生都是去美国深造。全球大约有70%的诺贝尔获奖获得者都在为美国工作。^④美国的人才掠夺是全球性的，从其立国之初就已经开始，至二战前后达到高潮。掠夺全球人才的直接效益就是：美国政治、经济、科技、军事成为全球唯一超级强国。对此，美国学者法里德·扎卡利亚认为，美国繁荣的秘密武器是移民。他认为，移民赋予美国优势和活力，从而在经济上不断取得进步。美国之所以没有

^① 关于美元在经济掠夺中的作用，可参见刘福堆：《金融殖民》，中信出版社，2011年版。

^② [意]乔万尼·阿里吉著，路爱国等译：《亚当·斯密在北京——21世纪的谱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42-143页。

^③ [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杨宇光等译：《国际关系政治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56页。

^④ 王辉耀：“中国发展的紧迫任务”，《人民日报》，2010年6月25日。对人才在国际竞争中的作用，还可参见王辉耀：《全球人才流动已成为新的大趋势》，2019年7月19日，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3958865。

重蹈英国和历史上其他经济大国的覆辙，原因正在于此。^①

历史的实践证明，美国在二战后所网络的科学家为美国的军事、经济和科技做出了无法量化的巨大贡献。^②如果从战略性的研究领域来看，在所有重大科技项目中，均有外国出生的科学家在其中充当关键性角色。正因为聚集了全世界最多的顶尖人才，美国才能成为超级大国。随着经济全球化和知识经济的迅猛发展，世界正从工业经济转向知识经济、信息经济。在数字经济时代，人才、大数据的红利和重要性等同于石油、金融等战略资源。美国因此也想方设法把世界各国的顶级人才吸引到美国，通过移民政策攫取他国的智力资源资源，进而继续维持自己的“科技霸权”。

（五）国际制度的非中性化

从获利的角度分析，制度是非中性的，谁拥有设定国际制度的主导权，谁就能从制度中获取红利。当今的国际秩序是由各类国际组织、国际法和规则组成的，但大多数被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所主导。国际制度虽然从程序正义的角度来看，在表面存在公平性，但在具体执行和细节实施上并不是公正的。例如，诺贝尔经济学得主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就斥责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政策制定与实践过程。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受富裕国家政府的政策导向所支配，它实际上代表着财富与权力的旨意。^③斯蒂格利茨指出，所有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申请紧急援助的国家，都有同一类药方等着它们：私有化 → 资本市场自由化 → 市场定价 → 缩减贫困策略（如强调自由贸易）→ 在经济与政治上形成对西方国家的路径依赖。美国的经济学家珀金斯在《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一书中以自己亲身经历，形象而细致地描绘了国际银行家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秘密金融战的始末，^④这为斯蒂格利茨的观点加上了精彩的注脚。

另外，西方所谓的“人权法制、自由民主”都有双重标准。例如发达国家的法律在坚持一系列的保护主义政策的同时，却鼓吹开放市场，允许商品和资产跨国流动。在追寻新自由主义世界的过程中，法治被认为是一种普遍性的法律系统，但它对西方发达国家企业行为的技术垄断、知识产权的垄断、市场垄断以及价格垄断等行为则置若罔闻，典型的做法是采取双重标准，或者实行长臂管辖权。^⑤如何改变这种现状，劳尔·普雷维什认为，唯有工业化才是外围国家经济发展的发动机。^⑥因此，他主张建立新的国际经济秩序，其实质在于摆脱西方国家经济制

^① [美]法里德·扎卡利亚著，赵广成等译：《后美国世界》，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第193页。

^② 李其荣、倪志荣：“当今世界人才争夺战的最大赢家”，《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8期。

^③ [美]斯蒂格利茨著，夏业良译：《全球化及其不满》，机械工业出版社，2010年版，第12页、第46页。

^④ [美]约翰·珀金斯著，杨文策译：《一个经济杀手的自白》，广东经济出版社，2006年版。

^⑤ 万喆：“美国‘长臂管辖’盯住欧洲”，《人民日报》，2014年9月2日；徐超、单超：“美对我滥用‘长臂管辖’及其应对”，《世界社会主义研究》，2017年第9期。邓欢：“长臂管辖权的滥用及对中国的影响”，《法制与社会》，2019年第4期。

^⑥ [阿根廷]劳尔·普雷维什著，苏振兴译：《外围资本主义：危机与改造》，商务印书馆，1990年版，第227页。

度的锁制，从而改变落后国家的经济地位。

美国主导的国际规则和条款一方面具有公共产品的特性，另一方面则主要基于美国的利益。美国设定的诸多规则多以公平和公益自居，但其实并非完全“中性”，很多细节中都藏着对美国有利的条款。可以说，当今国际机制的解释权和主导权大多掌握在美国的手中。当然，随着时间和国际力量对比的变化，当美国觉得自己设定的规则不符合自身利益的时候，美国会跳出原有的框架，随时制定新的规则来维护自身利益。例如，美国特朗普政府自2016年以来就不断采取“退群”外交方式改变规则，其原因就在于美国感觉自己在旧有的国际制度中不再获利，故而欲摆脱其束缚，图谋修改或另立新规而有利于美国。

（六）战略资源的垄断化

掌握对资源的控制权，主要表现为对大宗商品的控制。^①由于在国际市场中，几乎所有的大宗商品都以美元计价，因而美元的走强或走弱，其本身就是影响国际商品价格的一个重要源头或因素。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波动幅度并没有遵循市场规律，而是背后的政治与军事因素在起实质性操控作用，已经突破了以供求理论来解释的模式，美国主导的金融化与虚拟化是其价格波动的关键内因。美国学者苏珊·斯特兰奇认为，金融市场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拟经济的波动平台，实体经济“定价话语权”是由金融市场决定的。谁掌握了结构性权力（如金融市场的决定权），谁就能掌握大宗商品定价权。^②作为超级大国的美国，它在某种程度上具备这种权力和能力。

目前为止，世界不到10亿人消耗了全球3/4的资源，在未来的20年中，由于发展中国家不断会产生相当规模数量的中产阶级，这将会增加20亿消费者。这一激增将加剧原材料和工业制成品的争夺。^③基辛格曾说，“控制石油就能控制其他所有国家；控制了粮食也就等于控制了所有的人；控制了货币就意味着控制了整个世界”。^④所以，对于后起的新兴国家而言，其发展必然受到美元石油的制约。对此，威廉·恩道尔在《石油战争》一书中描述到，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的工业和农业发展在未来必将深受英美石油政策之害。^⑤运用经济上的绝对优势和实力，美国成功在二战后完成了美元霸权的建构；运用政治和军事上的超级实力，美国成功掌控了中东产油国的石油供给与价格的决定权，建立了石油霸权。美国将美元、石油与粮食这三种霸权进行融合，构成了历史上的一个新型帝国，其治理手段已经与传统大国有本质区别：从直接的领土人口控制发展到对关键战略

^① 大宗商品主要指用于工农业生产与消费的而需要大批量买卖的物质商品，一般可将大宗商品分为四个类别，即能源商品、基础原材料、大宗农产品及贵金属等。

^② [英]苏珊·斯特兰奇著，杨宇光等译：《国家与市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21页。

^③ 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编：《全球趋势2030：变换的世界》，时事出版社，2013年版，第133页。

^④ [美]威廉·恩道尔著，赵刚等译：《石油战争》，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版。

^⑤ [美]威廉·恩道尔：《石油战争》，第166-167页。

资源的间接控制。美国罗伯特·基欧汉指出，霸权稳定的一个重要表现是保持物质资源的优势。而原料、资本、市场以及在高科技产品生产这四项资源非常重要。^①因此，对大宗商品的定价机制的控制权已经成为各大国的重要利益诉求。随着信息技术和数字化革命的持续深入，美国的芯片技术和网络数据垄断也日益成为美国的战略资源，美国依仗其优势借此打压其他国家，谋求其霸权利益。

四、中美竞合是洛克式博弈关系

洛克式博弈就其特征而言，是指核大国在博弈过程中遵循“生存与允许生存”的原则，以竞争与合作并存的方式谋求权力并实现本国利益。其中，对洛克式博弈起决定性作用的是毁灭性战争武器的出现，因为核大国之间掌握了确保相互摧毁的核军事力量，这就让核大国之间的核战争没有最后的胜利者。具体就中美关系而言，霍布斯式博弈不再是两国竞争采取的终极选项。从内容上分析，洛克式博弈本身就有竞争与合作两个方面的内涵。

二战结束后，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在与其他国家博弈中，美国除了对某些非核武器国家采取传统的暴力手段外，对于大国特别是核大国，美国往往采取贸易战、提高市场准入、操纵货币、使用金融手段、实行技术控制，甚至操控一些国际政治与经济组织来和对手进行博弈，这些手段可以说都是非战争方式的博弈手段，具有洛克式博弈的性质。美国在2018年发动的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就是洛克式博弈的一个典型例子，中美贸易博弈折射出两国洛克式博弈的方式和手段。

第一，美借以“法治”之名利用国内条款制造贸易冲突。一般说来，美国针对其他国家的贸易战或贸易争端主要分为两类：一是依照WTO规则实施反倾销、反补贴；二是根据美国国内贸易法（主要是1974年贸易法案）实施各种调查，这些条款主要有“201”条款、“301”条款、“特殊301”条款、“232”条款以及“337条款”，其内容和范围主要涉及知识产权、市场准入、政府补贴等问题。例如，在2018年1月23日，美国在WTO范围内针对电冰箱和太阳能电池板征收50%和30%的关税，随后又宣布对钢铁征收25%、对电解铝征收10%关税。又如在2017年4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发出备忘录，指示美国商务部部长根据《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就进口钢铁及铝材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进行调查（232调查）。随后，美方根据《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正式对中国启动调查（301调查），以确定中国的技术转移、知识产权及创新等领域的作为、政策和做法是否不合理或

^① [美]罗伯特·基欧汉著，苏长和译：《霸权之后：世界政治经济中的合作与纷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1页。

具歧视性，以及对美国商业造成负担或限制。以此为依据，美国启动了对中国输美商品征收25%的关税行动。

在本质上，美国所谓的“法治”手段都是美国攫取他国利益的工具。在2018年9月，我国政府发布了《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揭露了这种所谓“法治”手段的虚伪性：就贸易公平性与合法性而言，美国自身存在大量扭曲市场竞争、阻碍公平贸易、割裂全球产业链的投资贸易限制政策和做法，如违反公平竞争原则、歧视他国产品、滥用“国家安全审查”阻碍他国企业在美正常投资活动。提供大量补贴、扭曲市场竞争、使用大量非关税壁垒、滥用贸易救济措施等。美方片面强调“美国优先”，将国内问题国际化、经贸问题政治化。^①可以说，美国根据的“301 条款”调查报告严重违反了世贸组织最基本、最核心的非歧视原则，贸易自由化原则，体现的是美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零和思维，美国试图寻找其国内所谓的“合理性”条款依据，借以法治和条例之名实施本国意图，为其牟利。

第二，利用产业价值链的格局与分工对中国进行打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欧美国（特别是美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形成的产业链结构大致是：高端高技术和高利润在美国，中低端、低利润高污染产业则主要分布在以中国为代表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随着中国制造业整体实力不断提升，中国企业正从全球产业价值链的中低端向中高端迈进，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不断优化。中国对美出口结构正逐步从劳动密集型等低附加值产品，向资本密集型和高科技等高附加值产品转变。此外，在新一代信息技术获得迅速发展、第四次工业革命日新月异的背景下，信息技术与制造业融合发展成为未来新一轮技术革命的重要特征。为了把握新一轮全球经济竞争的主导权，各国希望通过在优先领域的科技部署，实现在重点领域的技术突破，抢占新经济的制高点，实现新一轮产业革命并重塑全球经济格局。

对美国而言，如果中国的产业顺利实现升级，中国必将获得产业主导权的制高点。美国认为“中国制造2025”、^②“一带一路”等政策规划会影响美国科技霸主和高端制造业领先地位，故力图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快速崛起。在本轮中美贸易争端中，美国以保护“国家安全”和解决“知识产权”为借口，对中方采取的贸易打压手段包括：通过知识产权诉讼精确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禁止中国进入美国和投资美国高科技企业、禁止向中国出口高科技产品、收取不合理专利费用和获取不合理权益、合资控制中国企业发展、高价设备和原材料销售、生态

^① 《关于中美经贸摩擦的事实与中方立场》白皮书，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网站，2018年10月9日，<https://www.fmprc.gov.cn/ce/ceka/chn/sgxx/t1601372.htm>。

^② “中国制造2025：从制造大国迈向制造强国”，中国政府网，2017年8月10日，http://www.gov.cn/guowuyuan/2017-08/10/content_5216727.htm。

控制封锁以及直接精确制裁等，^①例如在华为5G技术领先美国的问题上，为打击中国高科技企业，美国总统于2019年5月15日签署《保障信息与通信技术及服务供应链安全》的行政令，宣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要求美国企业不得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②美国目的就是保持美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保持垄断优势，防止中国产业升级威胁美国科技的霸权地位。因此，美国违反WTO原则挑起针对中国的贸易摩擦，遏制“中国制造2025”的意图不言自明，其根本目的是要将中国“规锁”在产业价值链的下游和末端。

第三，在科技人才博弈方面阻断交流，防范和遏制中国科技进步。人才是科技的立足之本，在高科技人才竞争方面，中美之间的矛盾呈现除尖锐化的趋势。随着中美贸易摩擦的升级，在中国科技不断进步的背景下，美国加大了对中国人工智能和其他科技人才的监控、技术封锁和打压，在客观和现实中形成美国的“技术歧视”。^③

更有甚者，美国以所谓的“间谍论”阻止华人科学家接触美国高科技领域。另外，美国对中国赴美交流学者的限制也日渐趋严，领域也不再局限于高科技行业，甚至蔓延并影响到了其他学科的学者之间的正常交流。面对中国科技实力增强以及中美在创新能力方面的差距逐渐缩小，一些美国政客心态扭曲，华人科学家有时不幸成为被打击对象，正常的学术交流也受到压制。

第四，美国利用战略资源来控制 and 封锁中国。我们知道，在信息化、智能化和大数据时代，半导体芯片扮演着核心角色，万物互联，无芯不灵。美国是全球最大的半导体消费市场，也是最大的生产国，主导了全球半导体与电子产品的发展，芯片日益成为美国手中的一张战略资源牌。相比之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半导体芯片消费市场，但长期以来，我国集成电路严重依赖进口，贸易逆差持续扩大。中国半导体行业协会（CSIA）的统计数据显示，2018年中国进口集成电路4175.7亿块，同比增长10.8%；进口金额3120.6亿美元。^④对于另一项战略资源——石油来说，2018年中国原油进口金额为2402.6亿美元，^⑤两者相比较，芯片进口的数额是石油进口的1.3倍，可见其作为战略资源的重要性，同时也说明了

^① 自2018年以来，美国通过投资限制、出口管制以及政府采购限制等多种手段遏制我国企业在美乃至在全球发展。2019年5月15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美国企业不得使用对国家安全构成风险的企业所生产的电信设备而进入紧急状态。随后，美国商务部发表声明称，正将华为及其70个关联企业列入美方“实体清单”，禁止华为在未经美国政府批准的情况下从美国企业获得元器件和相关技术。

^② 《美国因华为进入“紧急状态”？中国外交部：蓄意抹黑中企》，载《参考消息》，2019年5月16日，<http://www.cankaoxiaoxi.com/china/20190516/2380262.shtml>。

^③ 克雷格：“美国对华‘技术冷战’祭出人才监控、技术封锁和企业打压大招”，腾讯网，2018年2月28日，<https://new.qq.com/omn/20180228/20180228A0L2CZ.html>。

^④ “2018年中国集成电路产业第四季度运行情况”，中国半导体行业信息网，2019年3月9日，<http://www.csia.net.cn/Article/ShowInfo.asp?InfoID=82645>。

^⑤ “2018年中国原油进口4.619亿吨 花费1.58万亿人民币”，国际石油网，2019年1月14日，<http://oil.in-en.com/html/oil-2857055.shtml>。

芯片对我国信息产业至关重要的战略价值。我国是最大的芯片使用市场，但却长期依赖从美国进口。而在相对稳固的全球芯片产业格局中，国内企业也处于弱势地位。因此，美国认为，由于在设计和制造高端芯片方面，美国比中国更具优势，对中国发动芯片战，可以减缓竞争对手中国的步伐。^①

由于中国科技企业华为公司的5G技术先进，有可能会挑战美国成为“领跑者”，在标准和技术方面确立自己的话语权，美国政府对其进行打压和遏制。美国商务部官方网站在2019年5月发布消息称，华为被列入所谓“实体清单”的决定，美国也试图说服其盟友不要使用华为5G技术。美国借芯片技术优势，对中国相关企业施以制裁，将封锁范围扩大到中国几乎全部的高科技产业，让中国企业时刻处于被“卡脖子”的风险之中。美国此举可谓司马昭之心，其目的在于阻碍中国推进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进程，遏制中国科技产业的迅速崛起。

第五，通过建立与退出的方式，反复利用国际制度为己牟利。如果说美国积极倡导建立各类国际政治与经济制度（包括国际组织）是为其利益服务的，那么，美国最近频繁退出各类国际组织和协定，其目的也是为了不受到相关条约限制，而追求美国利益的最大化。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先后退出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巴黎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球移民协议》、《伊核协议》、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万国邮政联盟、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北美自由贸易协定。此外，特朗普政府还威胁要退出WTO，声称WTO多年来待美国不公，WTO需要改革，要改变其行事方式。^②特朗普政府“退群”行为给世界的一个印象是：“特朗普的美国反对之前的美国”。其实，美国无论是建立国际制度，抑或是退出相关制度，都是根据其自身利益来考虑的。

现存的国际规则大多数是以美国为主导而建立起来的，随着国际力量对比的演变，有些规则对美国而言就变成了一种束缚，美国产生了强烈的修改相关国际规则的意愿。对于美国而言，退出相关国际协定和组织，美国不需要付出成本，而留在这些协定和组织之内，却需要承担更多的义务。学者任琳通过分析美国的“退群”行为，认为特朗普的“退出外交”旨在摆脱制度约束，拒绝继续支付乃至转嫁部分治理成本，同时又达到消耗对手权力资源的战略遏制目标。^③也就是说，美国退出一些国际组织和协定并不是让出它在国际制度中的主导权地位，而是在充分利用退出却不用承担成本的方式，达到胁迫国际社会同意让其重新塑造对自己有利的国际机制之目的。

^① Kelvin Chan, “Chip Wars: Tech rivalry underlies US-China trade conflict”, <https://phys.org/news/2018-05-chip-wars-tech-rivalry-underlies.html>.

^② John Micklethwait, “Trump threatens to withdraw from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IME*, August 30, 2018, <https://time.com/5383420/trump-world-trade-organization/>.

^③ 任琳：“‘退出外交’与全球治理秩序——一种制度现实主义的分析”，《国际政治科学》，2019年第1期，第84-115页。

此外，美国有学者分析认为，由于美国拥有“过分的特权（exorbitant privilege）”，通过退出各类组织和协定、与中国进行贸易博弈，导致不确定性因素增加，虽然这些不确定性因素会导致全球经济风险上升，但美国就可以利用这种“过分的特权”来巩固美国经济。^①在全球经济动荡时期，“过分的特权”意味着避险资金的流动有利于美国的金融环境，尤其有利于“零风险”的美国国债市场。如果这种流动与美联储短期利率的缓慢上升以及美国政府的大规模财政扩张相结合，全球性的动荡实际上可以让美国在经济上跑赢世界其他国家，美国过学者认为世界经济波动对美国其实是有益处的。所以，发动对中国的贸易战就成为“美国优先”的一项政策选项。

五、结论

治理手段的变迁让大国（特别是核大国）之间博弈脱离了旧有的以战争与殖民方式进行殊死博弈的状态，新式治理手段将中美博弈纳入到洛克式博弈之中。具体而言，美国对中国发动的贸易争端既具有技术性特点，又具有战略性的特征。

如果从博弈的战术性角度来看，美国此轮对中国采取的手段大致如下：一是美国利用国内法，旨在借由美国的国内“法治”来实施“长臂管辖”。二是对中国实施严格的高科技出口管制，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发展；三是利用汇率问题，威胁将中国列为汇率操纵国；^②四是利用WTO的相关机制对华发起反倾销、反补贴和特别保障措施，同时也胁迫世贸组织修改规定，满足美国的利益诉求；五是美国利用“非市场经济地位”问题牵制中国；六是利用其意识形态价值观来干扰中国内政，影响中国发展进程。总体而言，美国此次挑起美中贸易摩擦的目的和实质在于继续巩固美国的霸主地位、重新制定世界经济规则，遏制中国的快速发展。

采取何种贸易政策理论其实具有战略性，正如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所认为的，各国对外贸易政策的选择应全面考虑其对国民经济发展的影响，贸易政策的选择要依据该国当时所具备的各种条件及所达到的经济发展水平。^③特朗普政府的战略性贸易政策强调政府要干预贸易，推动本国企业和产业发展，重整美国制

^① “过分的特权”一词由法国前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Valéry Giscard d'Estaing）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指的是美国作为国际储备货币发行国所获得的好处。美元在全球经济中的作用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安排：只要全球经济风险上升，资金就会流入美国，美元就会升值，哪怕经济动荡来自美国本身亦不例外。相关文献参见 Barry Eichengreen, *Exorbitant Privilege: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Dollar and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Gourinchas, H.Rey, “From World Banker to World Venture Capitalist: The U.S. External Adjustment and the Exorbitant Privilege”, in R. Clarida, ed., *G7 Current Account Imbalances: Sustainability and Adjustment*,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p. 11-55; Christopher A. McNally, “Is Trump Weaponizing America's Exorbitant Privilege?” <http://cn.chinausfocus.com/finance-economy/20180823/32055.html#eng>.

^② 2019年5月23日，美国商务部发布公告称，拟对其认为“压低本币兑美元汇率从而补贴出口的国家”征收反补贴税。新规定可能令包括中国在内一些国家的产品面临更高的关税。

^③ [德]弗里德里希·李斯特著，杨春学译：《政治经济学的自然体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造业，这从本质上是一种旨在促进美国战略性产业发展的对外贸易政策。从战略思维的角度看，中美贸易博弈其实超越了贸易摩擦本身，是产业政策、投资标准、技术创新和国家产业发展战略等诸多层面的一次重大博弈。

但是，与中美在建交前的剧烈冲突相比较，在此次两国的贸易博弈过程中，美国采取更多的是洛克式博弈手段，没有选择暴力性质的霍布斯手段，关键在于中美两国都是核大国，彼此博弈需要遵循“生存与允许生存”的底线原则。虽然中美贸易摩擦与博弈具有战术性与战略性的双重特征，但两者间的博弈则处于洛克式博弈的框架之下。在21世纪，在博弈双方都具备核毁灭能力的情况下，大国通过霍布斯式博弈方式来攫取利益的模式很难为继，因为这会让自己付出的代价（如军事代价）与获得的收益并不匹配。双方采取洛克式博弈进行竞争与合作，谋取有限度的可控利益才是大国博弈的主流选项。总之，中美之间解决分歧、化解矛盾的手段还有很多，中美贸易博弈完全可以在洛克式博弈格局下进行，而不必图穷匕见地滑入到霍布斯式博弈的悲惨旧巢。